

- 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
- 中国城市化建设丛书
- 齐康主编 城乡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丛书

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

——以江南地区为例

李立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
- 中国城市化建设丛书
- 齐康主编 城市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丛书
- 同济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行动计划资助(2006KJ016)

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

——以江南地区为例

李 立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乡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这一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近年来,“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引起政府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建筑学角度出发,结合旁系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乡村生活的空间载体——乡村聚落进行交叉、整合研究。作者选取我国经济、文化素来发达的江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乡村聚落形态的内涵与整体特征进行了全面剖析,进而以乡村变迁为主线,力求再现该地区乡村聚落演变的历史脉络,探寻其演化的主导动力与运作机制,剖析其中各种现象的规律性和真实性,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乡村聚落的更新与建设,以期保留、恢复、发展乡村特有的健康的生活图景,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促进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策略。

本书适于建筑设计、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阅读,同时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以江南地区为例/李立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3
(中国城市化建筑丛书. 城乡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丛书/齐康主编)
ISBN 978-7-5641-0397-2

I. 乡... II. 李... III. 乡村建设—研究—中国 IV. TU9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9573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 江汉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480 千字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41-0397-2 / TU·100

定价: 48.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同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25-83792328)·

齐康主编

城乡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丛书

- 城镇群体:形态、演化与意义 谭 颖
- 城市空间:形态、类型与意义 陈 泳
- 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 李 立



作者简历

李 立

1973年5月 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
1989—1994 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学士
1994—1997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建筑学硕士
1997—2002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工学博士
2003—2005 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2005至今 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

本文的重要特色在于：一是把江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放在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中……二是把社会经济发展与聚落形态演变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在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大量数据占有与分析基础上提出很多颇有创意的见解和思路。

——崔功豪

提出的乡村聚落形态的整体观与整体协调发展、聚落形态的演化过程是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聚落形态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等观点,对从事乡村居民点规划和改造者具有参考意义。

——沈道齐

撰写人深入到了必须去的地方,作了较为刻苦的调查和研究,因而对情况、形成、原因、对策等等,我认为均符合实际情况,真正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在当今研究生中需要提倡的风气。

——朱通华

分区域地研究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在建筑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该论文所研究的江南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它既具有古老的文明史,又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前沿。因此,对这样有大发展跨度的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

——丁沃沃

作者基于一个整合的观点和立场来开展乡村聚落研究,虽然有极大的难度,但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整体系统研究,对于乡村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切入的方式我认为正确的。

——王建国

对当前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边缘化和空心村化的分析和评述具有独立的见解,论述深入,这也是我国当前城乡建设中应当给予重视的重大问题,而作者提出的调整着眼于乡村发展的整体性原则,为解决以上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

——段进

较准确地把握了江南这一地理单元的文化特质……其颇具针对性的阐释较为明晰地勾勒了百年以来影响江南乡村演化诸层面的特色和轨迹,且并非简单、线性地就形态论形态,而是将其置于相关背景中作深入地考察和把握。

——张十庆

论文系统研究了江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立论正确,系统性强,资料翔实,对于今后江南地区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郑炘

论文抓住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研究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其中区域性整体城镇化的观点对于江南地区、乃至我国其他发达地区和人口密集地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种深入实际、探究中国基本问题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仲德崑

……以极为广泛的角度着重研究其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及客观规律,无疑对人类聚居环境科学研究和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阳建强

本文获得 2005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序

事物发展有个过程,而过程又不断地连续,从这个时段开始,又从那个时段切断。我们可以从某个时段中寻求出事物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从城市和建筑形态的变迁来剖析,它可作为事物历史的研究形态特点的表述、演化,为今后工作作出某种重要的启示。

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现状是多么重要,它是城市现实的形态,它组成了城市构成的肌理,改变或者保护都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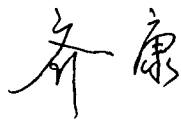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从年轻时代就注重调查研究,他成名之作就是《江村经济》,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并获好评,之后他又撰写了《乡土中国》等著作。改革开放初期他带领众多学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这一著作,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可见不断地调查、分析、实践是我们获得真理的重要手段。

《城乡建筑形态转变和哲学思辨》的课题中,我们由三位博士研究生以苏州地区、苏州古城区、江南乡村聚落形态等为例作了调研,形成博士论文,之后结合他们的工作实践经验修改完成了各自的书稿。它们均为高水平的优秀的著作,其中:谭颖同志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苏州地区城镇群体、形态、演化意义》;陈泳同志研究的是《苏州古城结构形态演化研究》;李立同志研究的是《江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他们的研究展示了有着二千五百多年的我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和建筑形态。

正好像费老的课题研究一样,一种追踪的调查,把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城市、建筑、基础设施的演化在一种时间段内进行“切片”、分析。研究历史上彼时、彼地、彼情,到了今天即此时、此地、此情的差异。我们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城市化比率不断提高,工业化、社会化将产生一个令我们难以想象的结果。处在这个历史上千载难逢的转型期,我们的研究会给后来者参考。同时,此项研究不仅对苏州地区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年轻的博士研究生都在逐渐成熟,他们当中有的负责一个城市的领导工作,有的成为高校的骨干教师和学者……他们终将成为社会的栋梁,祝他们成功!

求学勤奋,做学始终,这又将成为他们一生事业成功的起点。



2006.9.26.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动态	2
1.关于聚落的研究	2
2.关于中国乡村聚落变迁的研究	4
三、研究内容	9
1.相关概念辨析	9
2.研究方法	11
3.研究框架	12
第一章 乡村聚落形态演化的整体观	14
一、乡村聚落形态的内涵	14
1.聚落形态的构成要素	14
2.聚落形态的整体结构	14
3.聚落形态的空间层次	15
二、乡村聚落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	15
1.乡村	15
2.城镇	17
3.城乡联系	19
三、乡村聚落形态演化的社会过程	22
1.社会文化结构	22
2.经济技术结构	23
3.政治政策结构	23
4.自然环境结构	25
四、小结	28
第二章 均衡:自然生态制约下的传统聚落形态	29
一、农业结构的变迁	29
1.雄厚的农业基础	29
2.人口增长与人地矛盾	30
3.经济结构的调整	30
4.小农经济的过密型增长	32
二、早期市镇的勃兴	32

1.水运网络的完善	32
2.市镇发展的特点	33
3.市镇人口的职业构成	34
4.市镇的社会生活特征	35
三、农业文明的底色	36
1.乡与土的观念	36
2.血缘和地缘的集群	37
3.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架构	37
四、聚落形态的空间特征	40
1.乡村聚落的分布形态	40
2.村落形态的均质特征	42
3.市镇形态的异质趋向	45
4.区域中心与边缘的差异	49
5.形态生成的自组织规律	53
五、小结	60
第三章 转型:近代工业化的影响	63
一、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63
1.国际贸易的影响(1840~1900 年)	63
2.近代工业着陆(1900~1949 年)	64
二、近代城市的崛起	65
1.近代交通的影响	65
2.城乡社会经济分异	65
3.城乡联系的变化	67
三、传统市镇的兴衰	67
1.市镇网络趋于完善	67
2.市镇之间的分化	69
3.市镇结构的调整	70
4.市镇城镇化进程加速	71
四、走向败落的乡村聚落	73
1.落后的土地分配制度	73
2.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75
3.乡村生活世俗化的倾向	76
4.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	77
五、小结	78
第四章 徘徊:国家意识建构的乡村变迁	81
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	81
1.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背景	81
2.乡村基层组织的重建	82
3.变革从土改开始	82
4.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84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85
1.国家引导地区产业转换	85
2.服务于工业化的城市化策略	86

3.城乡壁垒日益完善	86
三、乡村市镇的变迁	87
1.政策调控下的阶段性发展	87
2.行政区划导致的市镇分化	88
3.市镇形态的演进	90
四、徘徊不前的乡村聚落	93
1.乡村经济停滞不前	94
2.乡村文化的二元结构	97
3.迷失的乡间聚落	99
4.变革的前哨	103
五、小结	104
第五章 剧变：乡镇工业异军突起	107
一、乡村工业化与聚居生活方式发展	107
1.政治经济体制的新变革	107
2.乡村经济的大发展	109
3.乡村聚居生活方式的演进	112
4.社会结构分化与乡村文化更新	117
二、城乡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善	121
1.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的转变	121
2.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123
3.城乡关系的改善与多元分异特征	124
三、独具地区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127
1.居住迁移的地区特点	127
2.居住迁移的多元发展趋势	130
3.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化进程	132
4.城镇化进程的地区特点	142
四、乡村聚落空间的多元形态	144
1.城镇化进程中的聚落空间发展态势	144
2.乡村聚落的多元分布形态	154
3.村落形态的多元特征	158
五、小结	174
第六章 调整：着眼于乡村发展的整体性前瞻	177
一、一个总结	177
二、现实发展的背景因素	177
1.外部：区域城乡整体发展的内在要求	178
2.内部：乡村变迁的新趋向	183
三、乡村聚落空间发展策略的反思与调整	186
1.城镇化策略的反思与调整	186
2.乡村聚落发展策略的反思与调整	193
结 语	199
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07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星汉错落般地散布着数以百万计的自然村落。千百年来,其间生存着的向土地求生的无以计数的农民风餐露宿、精耕细作,他们在以农业维持着自身生存和繁衍的同时,也发展出了闻名于世的农业文明^[1]。今天,尽管这一文明中的许多要素和构成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重负,但是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农业、农村和农民始终是我们这个农业国度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

19 世纪以来,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乡村一直未能摆脱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堆积在严重超载的土地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缓解,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工业开始成为农村主导产业,非农生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当时特定的历史与体制背景下,乡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带动乡村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而是出现了独具特色的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城镇化进程。从全国来看,1978 年至 1993 年城镇化水平从 17.92% 提高到 28.14%,其中中小城市(含小城镇)对城镇化总水平的贡献率达到 94%。在这种特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传统聚居生活方式、居住地结构开始变化,乡村聚落形态的各个层面都有新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现实发展趋势逐渐显示出新的变革方向。从工业化的角度,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乡镇工业增长率已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在城镇化的结构构成上,大中城市的规模效应正逐步显现;在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江浙沪地区,1990 年前低于 20 万人口的小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达到 24.9%,而 1990 年至 1994 年,20~50 万人口的中等规模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达到 24.8%,前者则降至 11.3%。这些新的变化趋势将成为影响乡村聚落形态发展的新的社会经济背景。

另一方面,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较早发生变化的地区已经较早地遇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以及如何真正有效地提高人们居住环境质量的问题。以江南地区为例,由于人口膨胀以及城乡建设的过度开发,人均耕地已下降到 0.62 亩*,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愈为突出,而且在量大面广的乡镇一级,普遍存在着人均建设用地超标的问题;早期以分散化、小规模、低水平起步的乡镇工业对环境造成日益恶劣的影响,土壤、水质和空气已遭到较严重的污染;在乡村建设上,经济发展虽然带来村镇建设高潮的到来,但巨大的投入并未形成良好的居住环境,村镇重复建设、无序扩张、千篇一律的现象极为普遍,而已有的政策体制大多因为就事论事并不能真正发挥功效,现代规划设计的介入没有充分研究乡村建设的固有特点,反而造成乡村“城市病”的愈演愈烈。上述各个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都对乡村聚落形态的整体研究提出了内在迫切的

* 1 亩=666.67 平方米

要求。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和政策体制的发展与转型将带来乡村聚落形态的相应变革,现实聚落环境质量的提高联系着区域发展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生产力重新分布趋势和城市化发展策略都从整体上影响聚落形态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在明确聚落形态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解决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将成为乡村发展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时期,针对较早面对此类问题的江南地区,从建筑学角度深入探讨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现实特征与方向选择,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动态

1. 关于聚落的研究

聚落的形成源于人类的聚居。聚居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个体之间往往彼此结成群体,群体内部以一定的结构关系维系。

从广义上来看,聚落在时间上涵盖传统村落到现代都市的变迁过程,在空间上跨越乡村、城市,以至于广义的人类生存空间。聚落的变迁过程也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走向多元化的过程。

聚落如此宽泛的内涵决定了对其开展研究角度的多元性,各学科间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相互融合渗透,使之成为诸多学科的共同课题。

(1) 人类学角度

人类学者较早有针对性地对人类的聚居行为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19世纪后期,欧美人类学者受进化论的制约,他们通过广泛收集二手的人文类型素材,猜测地构造宏观的世界文明史。直到20世纪20年代,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实地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

功能主义理论的首倡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通过对特洛布里安德岛(Trobriand)的长期田野考察^[2],奠定了人类学社区研究法的基础,在人类学界影响十分巨大。但此时人类学对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初始研究多是以处于尚未开化状态的原始民族为主,十分重视对在时空上严格界定的单个社会中的人文生活的描述。至三四十年代,马氏的学生费孝通对中国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这一调查使人类学开始从对野蛮社会的研究走向对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并开创了本土人类学的发展途径。人类学研究从此逐渐深入到人类现实的生产、生活层面,成为对人类聚居环境研究的重要领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功能主义的主流逐步被分流。格拉克曼(Gluckman)和利奇(Leach)通过对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强调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冲突现象以及政治变迁过程在民族志描述中的重要角色。对于文化积淀深厚、社会分化复杂、历史悠久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新的视角显得更具有分析效用^[3]。

(2) 社会学角度

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统称,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社会学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活动的结果及其依托——社会——的思考,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社会行动以揭示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和规律的科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相互包容,深入到人类聚居环境的内部活动及其结构关系。

最早将社会学与人类聚居环境相结合的是盖迪斯(P. Geddes),他继承和发挥了法国社会学家拉伯雷的学说,提出了著名的“地点—工作—人”的空间模式。20世纪初,以帕克(R.E. Park)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将人际互动、群体冲突和区位物质环境作为研究的重点,针对美国的都市化、移民、种族冲突、贫民、犯罪等问题作了大量的

实证研究,使社会学显示了从理论研究走向解决社会问题的实效。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学教授伯吉斯(E.W. Burgess)发展了帕克的学说,进而创立了以研究城市人与环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结构—功能”理论,对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社会学研究探讨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方法和政策,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既涉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大范围变迁又包含着个体、群体、机构、社区及其相互关系的微观实证研究,它的研究成果为人类聚落环境的多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

(3) 地理学角度

关于聚落环境的空间组织和区域研究是传统地理学统一主题的两个方面。20世纪中后期,在社会学研究^[4]的影响和带动下,地理学逐渐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结合,出现了人文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学派。人文学派和行为学派认为传统地理学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方面的作用。人文学派从历史和文化结合的角度,关注人们及其生活的环境,研究文化对地球表面的作用和它的区域表现形式;行为学派强调分析个人的决策过程,他们从日常生活的社会心理学出发,特别注意文化、价值、非正式团体、城市机构等在人类空间行为中的作用;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维(D. Harvey)在研究中以社会冲突为核心,强调对聚落环境的研究应从政治、社会、行政、文化背景加以认识,同时必须了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环境和政治权力的相互作用。以上研究都趋向于更多地参与到重大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的决策行动中,地理学对聚落环境的研究开始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

(4) 经济学角度

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如财政税收、土地管理、投资来源及投资方向等)与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从经济学角度对人类聚落环境的研究主要以经济发展与居民点分布及规模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它为研究影响聚落环境发展的经济因素提供了决策与依据。

在区域层次,经济学对市场、交通、行政影响范围的研究都以一定的居民点分布与规模假设为基础。不言而喻,居民点与工农业地区的发展以及公共设施的配置密切相关,因此在经济规划中,居民点的规划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城市型居民点层次,土地经济学可以解释城市用地的结构变化;针对较小的乡村型居民点,从经济角度对村落最佳规模的研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5) 生态学角度

生态学是研究人与自然界(生物圈)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科学和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人文科学。早期的生态学偏重于研究个体、种群和群落等自然生态系统,20世纪60年代逐步与人文科学结合,人类被看作生物种群中特殊的一种,生态学从此开始从把人类作为环境外界因素向把人类作为环境内部因素转变,这一转变源于人们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生态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标志着聚落环境的研究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得到了统一。

20世纪的百年历程,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如人口剧增、盲目开发、能源浪费、环境质量下降等等,因而,生态环境因素成为评价人聚环境的重要内容。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已经具有了清醒的危机意识,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产生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5]。

(6) 城市规划学角度

城市规划学是为城市型聚落环境的建设和管理提供设计蓝图的一门技术科学。它关注单个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和设计,注重为具体城市寻找合理实用的功能分区和景

观布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土地利用规划。在规划设计过程中,不仅运用建筑学、地理学作基础,还需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城市规划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城市型聚落环境的物质形态。

以上简单介绍了以人聚环境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学科,从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中后期,对人聚环境的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共同课题,这些学科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观察、剖析、认识、改造聚落环境,这既是社会经济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入的必然。

2. 关于中国乡村聚落变迁的研究

鉴于中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型聚落环境中,乡村变迁的方向和路途始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内容组成,自从传统农村社会开始解体时起,就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乡村变迁的不同时期,由于研究的背景不同和研究对象的变化,研究者所关注的内容亦各有侧重。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几类。

(1) 乡村变迁的方向

关于乡村变迁方向的探讨,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改变乡村面貌是靠革命还是靠改良?第二,乡村是自主发展还是朝依附城市的方向发展?

第一个问题的争论主要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兴起。当时各地的乡村建设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在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6]。“定县模式”的倡导人晏阳初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因此他所推行的乡村建设的基本内容是针对性很强的“四大教育”^[7];而梁漱溟所倡导的“邹平模式”则主张乡村建设绝不是单纯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或卫生建设,而应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建设,即“从中国的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8]。两种模式走的都是改良的道路,忽视了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对立,只是着眼于农村问题的现象和技术层次。

20世纪30年代,以孙治方、千家驹、李紫翔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以乡建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运动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评。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客观分析,他们指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就是要走组织农民的民主革命之路。社会学家陈翰笙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9],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并指出革命的基本力量不但包括佃农,而且包括自耕农。

关于第二个问题,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认为,中国变革的希望在农村,农村的希望在于农民,尤其是在贫雇农身上。千家驹关于中国农村出路所持的观点就属于这一类。梁漱溟虽把乡村看成是抽象的整体,但是在农村发展的出路方面,他还是认为必须依赖农村人自身的力量,走农村自救的道路^[10]。

与之相对应,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依赖于包括城市在内的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张发展城市工业以救济农村,同时吸引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缓解乡村人口压力,改善其生存条件。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发展区域性的交通设施、金融市场和管理意识,使城市工业带动乡村农业的发展,达到改变乡村面貌的目的^[11]。

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虽然也源于新中国成立前,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分歧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政策上走的是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道路,并没有达到以此带动乡村迅速发展的效果,反而日益增强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分立。改革开放后,乡村地区获得了一定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农业改革

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重视,但也并非始终如一,往往导致乡村发展的波动。

(2) 乡村变迁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由于乡村经济结构单一以及种种政策的限制,乡村中曾经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除了少数与行政关系结合得以维持之外,大多数都趋向衰落。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地区的乡村开创出以多种经营形式为主的富裕之路,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乡村工业化的道路,由此引发了关于乡村城市化方向的研究热潮。

费孝通是学术界倡导小城镇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早在《江村经济》(1938)中就已指出发展乡村工业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途径,到1981年四访江村时,他进一步注意到小城镇与农村发展的密切关系,并于1982年开始对小城镇进行研究,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大力支持。费孝通领导的课题组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小城镇大问题》系列^[12]、《小城镇区域分析》、《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等书收录了大部分的学术论述。

这些研究通过对乡村非农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调查,总结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关系到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其基本思路是: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工业化是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这是我国城市所无法容纳的。因此,工业不当集中在少数城市里,而应当分散到广大的乡村里去,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小城镇建设在中国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创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

国外学者施坚雅(G.W.Skinner)运用中心地学说^[13]对19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进行分析,通过对四川平原和长江中下游的详细调查,阐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区域城镇和居民点分布结构模式。他以集市作为乡村社区组织的核心,强调将反映中国社会自然结构的集市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的关于农村市场共同体变迁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为乡村城镇化模式提供了依据。

另一种相反观点同时存在,即乡村应走城市化的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方面批评在乡村居民点体系基础上发展的乡镇工业过于分散,分散布局对环境、资源压力愈来愈突出,缺乏聚集经济效益和统一治理污染的可能性,因此主张工业应当适当集中;一方面则认为中国城市尚有很大的容纳能力,中国乡村工业的前景是向城市工业转化。集中体现这一观点的较有代表性著作是郭书田、刘纯彬等著的《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990),该书认为乡村人口的前途在于进入主要靠农民自己力量兴建的大中城市,具体设想为以条件较好的县城、小城市和建制镇为依托,逐步建设上千个中等城市,在少数条件具备的地方扩建一批百万人口大城市,同时仍然保留和改造一部分小集镇。金福寿《适时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1993)一文则主张应放弃“离土不离乡”的提法,修正“发展小城镇”的设想,应当把“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乡村城镇化的战略取向。

(3) 乡村变迁的动力

学术界关注的乡村变迁问题在中观层次上即是从何处着手发展乡村的问题,也就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围绕人口问题、制度创新、产业改造、组织创新和观念创新等五个方面展开。

众所周知,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乃是中国乡村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许仕廉就在其《中国人口问题》(1930)一书中指出人口、土地、生活程度及社会文明是社会四大要素,而且人口问题又是其他三个问题的根本。当时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些主要观点有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如陈达、马寅初等);改良人口素质、提高人口质量(如潘光旦等);调整人口结构、改变人口空间分布与职业分布(如吴景超等)。80年代后,控制人口增长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围绕制度创新的主要观点认为农村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制度的不断创新,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土地制度的不断创新。土地制度在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阶段的反复后,逐步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今天,土地制度面临着再次创新的迫切要求。另外,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当前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是户籍制度创新和乡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主张产业改造的观点倡导改良乡村的原有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乡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振兴,从而推动乡村发展。这一观点中又可分为四类:主张“工业下乡”;主张通过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商品化;主张搞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主张科技下乡,推动乡村各业的高速发展。

乡村变迁过程中组织创新的思想发端于乡村变迁的早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改良派(如梁漱溟)与革命派(如毛泽东)的共同主张。它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乡村中的经济合作组织。一方面弥补小农个体经济的固有缺陷,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产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利于乡村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重视观念创新的人受到中西两种理论传统的影响^[14],强调乡村发展依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梁漱溟分析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失调,“中国之失败,就是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15]。近人李强在其《论贫困的文化》等论著中更是明确地将人的现代性低下、观念落后看成我国部分乡村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

(4) 乡村变迁的政策

学术界关于乡村变迁的政策研究,一般是从现实发展的成绩和问题中提出对国家政策的修正和发展的建议,包括国家工业化政策和城镇化政策,集中在为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产业政策、户籍政策、区域政策等具体政策提出改进的战略和措施。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研究系列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研究》(1989)、《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潜力与对策》(1992)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1996)对学术界和政府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叔莲等《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1993)和《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1996)介绍了国外城乡关系发展的背景、理论和发展过程,提出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具体方向。陈吉元、韩俊等《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1993)和《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1996)两书先后从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和类型以及城乡产业关系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分析。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1991)和《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1994)分析了乡村地区人口就业转移的现实特征,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城镇化发展方向。王积业、王建《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工业化战略选择》(1996)在关注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了乡村城镇发展的方向。张泽厚等的《中国现实经济模式的选择》(1998)从农村、工业企业和城市三个部分分析现实经济特征,并对乡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加以分类比较。张鸿雁等的《中美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发展基本规律比较——中美城市化比较的社会学视角》(1989)和《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现代化道路及方式选择》(1994),以详尽的比较为基础提出了不同与其他国家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向。

(5) 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现象与问题

现象与问题是研究乡村变迁过程中的微观层次。近代以来的乡村变迁,实际上是旧的因素不断解体,新的因素不断产生并逐步发挥作用的过程。在新与旧的冲突、融合中,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层出不穷。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工业化、乡村社会结构、乡村人口与流动、乡村教育和农民素质等方面展开。

关于乡村工业化的研究大多以实证的方式研究乡镇企业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

运行机制、行为特征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这方面的论著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编写的《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1987),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做的《大型乡镇企业经营与效益研究》(1987),威廉·伯德与林青松主编的《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1989),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的《别无选择——乡镇企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1990)等。同时,这类研究注意到乡镇企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特征,表示出对乡村各种发展模式的极大关注。这方面的论著有温州市委政研室的《温州经济格局》(1987),陆立军主编的《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研究》(1989),张留征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探索》(1990),朱通华与孙彬合著的《苏南模式发展研究》(1994)等。

早期关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多在社区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资料,努力描绘出一种与西方都市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如陈翰笙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等。8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专著当是美国汉学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16]。在这两部著作中,黄宗智从小农经济的商品化入手,探讨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及其连续的变迁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商品化是由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将此称为“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最后,作者将1979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归结为对“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17]。其他的一些研究,如陆学艺的《当代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1991)和《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1992)、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1991)、王晓毅的《血缘与地缘》(1993)、张乐天的《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变化变迁》(1995)以及郑杭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1996)等一系列专著,以自己翔实的记载和独特的视角丰富了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村的收益低微,大批农民离土离乡,涌进城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学术界开始探讨这一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张雨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吴江县四个行政村的调查》(1984)和朱宝树等《从离土到离乡——上海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分别以吴江和上海乡村地区为对象,详细调查了劳动力转移的特征。黄平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通过对江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四个村庄的调查,比较了劳动力外出的状况、原因和结果的差异。此外,陈家骥的《中国农民的分化与流动》(1990)、孟昕、白南生的《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1989)以及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等论著中,也都涉及农村人口外流现象的研究。

乡村变迁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农民,因此,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拓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农民自身尤其是其价值观念的变迁开始进入乡村研究的视野。白南生的《农民进取性考察》、黄晓京和林克雷的《农民意识的现代化进程》专门就不同职业群体的农民的现代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唐仲勋等人的《小城镇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大舞台》(1986)侧重分析了小城镇对农民现代性成长的促进作用;沈冰于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价值观的变化》(1986)着重探讨经济因素与农民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通过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近代以来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发生的明显嬗变。

以上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五个方面回顾了关于中国乡村聚落环境变

迁的部分研究,多偏重于乡村社会形态领域。事实上,与社会形态变迁同步发生的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变迁也引起了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对城乡和区域整体的普遍关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建筑学家刘敦桢即从事于民居建筑的研究,所著《中国民居概说》一书开创国内外学界对传统村落民居研究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地区性民居建筑的研究论文不时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其中《浙江民居》(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历史研究所,1984)的研究深入细致,揭示出传统村落民居建筑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之后,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992)进一步涉及传统村落建筑的群体组合及整体空间环境的分析,并且通过地区间的比较揭示出影响村镇聚落形态的诸多自然、社会、人文因素。

此外,东南大学建筑系《徽州古建筑丛书》(1993—1999)^[18]以大量实地测绘为基础,真实地记录了徽州传统村落的生活实态。书中对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人文历史、村落选址、民风民俗及社会发展所展开的详尽调查,为我国传统村落的深入研究做出了示范。其他如陈志华《楠溪江中游古村落》(1999),周若祁等《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1999),单德启《从传统民居到地区建筑》(2004)等著作都是同时期此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村(镇)整治与新村(镇)建设是建筑学乡村研究的另一热点,由于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该项研究尚处于积极探索阶段。

近年来,年轻学者研究的角度和深度又有了明显的拓展:刘加平《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科学化与技术化研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0125821)从生态技术的角度对传统民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丁沃沃《张家港市传统村庄研究》(2001)通过计算机程序编制探索了张家港地区村庄规划的新方法。段进《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2002)通过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两方面对太湖流域传统古镇空间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解析。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合作创立的生态建筑工作室(2003)则利用当地技术与资源探索乡村建筑与生产生活的结合及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看出,建筑学对乡村聚落进行研究的目的,或是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和鉴别,作为保护这文化遗产的依据;或是对它们的自然环境、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设计手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借以充实建筑创作的内容和方法。总之,注重于即时的微观的聚落单位研究。

而在城市规划界,鉴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和矛盾,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角度开展乡村聚落的研究也不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齐康教授所著《江南水乡一个点:乡镇规划的理论与实践》(1990)较早地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规划做出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金经元的《社会、人和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1993)论述了城市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需求、城市与乡村、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在《自然·社会·农村·城市——谈城市规划视野的拓宽》(1997)一文中进一步将乡村纳入城市规划的视野。陈秉钊的《江南村镇的体系结构、布局形态及发展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9378335)立足村镇体系的建构,针对乡镇群体进行了梳理、分层、归类研究。1999年,由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三校参加的“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针对沪宁城镇密集地区,从区域整体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探索土地利用、城乡协调和城镇群体环境等有关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综合对策。这些研究均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关注乡村变迁并主张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地拓宽了乡村研究的视野。但就处在社会基层的乡村地域而言,其视角过于宏观,尚缺乏梯度递进的分层研究,在具体的建设指导中也就相应地缺乏可操作性。

以上通过学科间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聚落空间演变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乡村聚落生活形态和居住环境变迁的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尚处于